

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之路：历史的经验与现在的可能

王江丽

[内容摘要] 本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谈了阅读《全球转型》的两大深刻感受和一个问题，即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批评、现代性研究的历史视角和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术语的使用问题，并以现代性的主要推动力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为工具来考察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过去和现在。本文认为，第一，中国是全球转型大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个体的独特性，但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特殊性。第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发端英国迅速遍及欧洲而后波及世界的现代性发展，都是与本土结合的过程。第三，现代性全球发展的历程和中国自身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为当下中国如何定位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参照。

[关键词] 《全球转型》 现代性 中国

[作者简介] 王江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的《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下文简称《全球转型》）一书是一部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的鸿篇巨著，2015年出版至今，世界各地的学者多有讨论和评析，在学界影响广泛。本文是笔者在该书中文版译者崔顺姬组织的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基础上整理而成，谈了两个阅读感受和一个问题，并从该书现代性三大推动因素出发反思中国现代性发展之路。

一、两个深刻感受与一个问题

（一）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批评

《全球转型》的作者在书中强调，关于19世纪以现代性发展为核心的全球转

型历史进程和它对世界的重要影响,学界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①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科对 19 世纪现代性发展之于国际秩序的塑造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重视不够,以至使学科本身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② 这一批评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研究。笔者曾指出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主要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的译介和学习,缺乏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基础学科的支撑和对中国自身历史发展中的国际关系思想和问题的必要关注。虽然目前已有国际关系学者陆续开始回到历史,发掘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思想资源,倡导“中国学派”,但对促成现行国际秩序基本架构和理念的 19 世纪现代性发展及其引发的全球转型缺少必要关注,也缺乏向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研究议题汲取营养的跨学科意识,特别是对晚清以降出现延续至今的“东西—古今”命题(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的难题,也称之为“中西—新旧”命题)之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身发展及所要研究和分析的中国参与世界的问题的关系没有引起重视。^③ 没有对这些历史背景和问题线索的充分认知,对当下中国自身定位、如何参与世界及处理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往往容易陷入空乏、说理失据,甚至影响现实中对外关系实践的理性和稳定性。过去“给外交部寄钙片”和最近的“战狼外交”现象都是很好的说明。正如布赞和劳森强调的,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全球性结构和国际行为体实际上是“漫长的 19 世纪”全球转型的产物,而且我们仍然并可能仍将长期处于一个被 19 世纪的全球转型所定义的世界之中。因此,如果不对全球转型之重大意义进行深刻的考察,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国际关系本身及其主题。从这方面来看,该书研究的立意和内容为国际关系学科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范本,即做好国际关系研究、促进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应该充分注意全球视野的宽幅度、历史基础的纵深度(19 世纪以来的现代性发展)、学科交叉的方法论(国际关系学、哲学、政治学、历史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reface.

② Ibid., p.5.

③ 参见王江丽:《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 年第 4 期,第 77 ~ 92 页。

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保持核心问题的敏感度(现代性发展的三大推动力：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作者这种学养和认知显示了国际关系英国学派重视历史、社会演化的特点。这令此书读起来厚重有加，同时问题清晰，逻辑顺畅，篇幅虽多也不觉冗长。

(二) 现代性研究的历史视角

作者以现代性从中心到外围的发展脉络来审视全球转型和国际关系，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而有价值的历史视角。不同于以往国际关系论著聚焦传统的国际关系主题即战争与和平问题，《全球转型》将重心放在 19 世纪现代性的生成、发展以及催生的全球转型，探究的是工业化、理性国家建构与意识形态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是一种大历史研究。因此本书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除国际关系学之外，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这在国际关系学界不多见。余逊达教授也评论《全球转型》以“现代性”发展为线索并将之视为国际关系发展和变化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全新的视角。^① 布赞和劳森认为全球转型最关键的三个组成要素工业化、理性国家建构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也即现代性发展的三大主要推动力，在 19 世纪两次工业化浪潮中改变了权力的模式及来源。理性国家塑造了今日世界的基本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等“进步的”意识形态则塑造了文明的标准，勾画出“文明”与“蛮族”两个世界的分野。换言之，三大因素重塑了权力模式，在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中带来了国家之间的权力鸿沟。全球转型裹挟着现代性从西方向世界蔓延生长，“无中心的多元世界”让位于“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西方国家在其中获得了全面的优势，塑造了文明的标准，形成“文明”与“蛮族”两个世界。19 世纪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经历彻底的权力变化，并掀起波澜壮阔的全球转型，从而奠定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因此，国际关系学科有必要对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视。而且在 21 世纪，“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正因为边缘

^① 余逊达教授 2016 年 12 月 3 日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全球转型》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地带的崛起发生新的变化，二者边界开始松融，中心不再稳固，多元世界似乎又成为一个回归的趋势，也就是书中指出的在走过全球现代性发展西方殖民时期和西方全球时期后，世界正处于现代性第三个历史阶段，即去中心化时期。那么 19 世纪的全球转型要素在今天是否有了新的变化？新一轮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将会呈现怎样的特征？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体系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变革？作为现代性后发国家的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与意识形态重塑的进程中，却在不断从“边缘”向“中心”靠拢的趋势下遇到“中心”和“边缘”界限模糊，甚至“中心”日渐消失的国际秩序变迁的现实，内外压力可见一斑。“东西—古今”命题依然悬而未决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可以从该书探讨的议题引发出来，给国际关系学者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三）一个问题：“进步的”意识形态？

在《全球转型》这本书中，“进步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progress）是全球转型的关键三要素之一。布赞和劳森在谈到使用 Ideologies of progress 术语时指的是系统的思想范式，特别是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科学”的种族主义，这些思潮植根于“进步”的思想理念，犹与启蒙思想中的层级、改良和控制的理念关系密切。而且布赞和劳森特别解释了这个术语下的各种思想也存在消极一面，即会将“进步”与否与“文明的标准”挂钩，并与“科学”种族主义一起成为“文明人”对“野蛮人”采取强制性行为的合法依据，如欧洲殖民主义被一种或多种“进步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而因工业化形成的军事上的优越、国家机构的控制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发达等使这一殖民主义成为可能。^① 就个人理解而言，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等为代表的“进步的”意识形态是随着工业化和理性国家建设逐渐形成并与之共同塑造现代性的体系化思想范式，这点在 2020 年 4 月和 6 月与布赞教授关于该问题的线上对话中得到确认。也即，作者在书中使用“进步的”意识形态术语时，并不参杂价值判断，而只是对那一时期涌现的思潮及其对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和评述，而这些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 ~ 7.

思潮自身则带有自认为是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和理论。但从字面上理解，“进步”一词本身充满争议，用之修饰的意识形态更加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特别是意识形态一词本身在中文语境下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在此谨提醒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尽量贴近作者使用该术语的客观性出发加以理解，避免目前全球高涨的“政治正确”、“种族歧视”等标签化解读。也得承认，虽然作者预先有所解释，但“进步的”意识形态从字面上容易令读者产生“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而与在物质存在上的显然与合理不同，“先进”和“落后”的概念在知识论上却是不合理的。^① 相对工业化和理性国家建设两个因素的物质性和技术性，第三要素“进步的”意识形态是观念性的知识和理论。与前两者具有存在论上的“先进”和“落后”不同，很难说现代性文明在时间上就先进于传统文明，在空间上就先进于被动接受现代性的其他本土文明。2016年关于特朗普总统上台的两篇评论文章就尖锐指出现代性文明并不总是先进的，“横扫全球的现代世俗文明永远不能彻底战胜那些似乎是神秘的、落后的古老轴心文明”，^②“自由主义故事”正在解体……^③。

二、阅读该书引发对中国现代性发展之路的反思

《全球转型》是一部全球视野的大历史作品，作者充分回顾和梳理了始于19世纪英国和欧洲并逐渐波及世界，由中心向外围发展的全球转型，探讨了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三大因素在全球各区域、诸多国家的发展脉络和状况，也包括处于外围区域的中国现代性发展。书中认为19世纪以来的全球转型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发展历程，有其多样性并且仍在继续。两位作者最新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合作文章借用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对为什么会有和如何“不均衡且融合性发展”的解释，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即现代性

① 赵汀阳：《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② 许纪霖：《特朗普为何横空出世？》，《许纪霖之窗》公众号，2016年11月9日。

③ 尤瓦尔·赫拉利著，陶小路译：《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自由意志终结？》，《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译自《纽约客》，2016年10月12日。

发展是以与本土相适应结合的方式曲折展开,而不是以完全接受和平滑展开的方式进行的,并且也因此在结果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① 这与爱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的“多元现代性”概念相类似。^② 罗森伯格认为现代性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在文化、经济、政治上千差万别,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而绝非同质化的过程,也因此在全球持续扩展和不断深化中造就了当下多元而深刻的世界秩序。^③ 这解决了关于现代性发展长期存在的一个争论或疑惑,即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之外的国家接受和发展现代性就意味着克隆西方模式。《全球转型》从全球范围的大视野通过丰富的历史研究支持和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第一轮现代化的国家主宰了全球国际社会之后,新的现代性混合体出现了,其中最突出的是亚洲小虎和中国,还有印度和从卡塔尔到爱尔兰的许多小国,这些现代性发展的国别差异可以说实证性地反驳了现代化即西化的说法。这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现实探索和关于该议题的研究都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著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高力克对《全球转型》一书有高度评价。他认为借用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三大分析工具可以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之路,重新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虽然关于现代性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三段式概括,例如郭嵩焘、梁启超的“器物—制度—文化”说;金耀基的“器物技能—制度—思想行为”说;殷海光的“外层(器用)—中层(制度)—内层(价值观等)”说等,但作者的三大工具以其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感为反思中国现代性发展之路提供了一个更宏大的全球背景。^④

(一) 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的“东西—古今”命题

“东西(或中西)—古今(或新旧)”命题指如何处理东方或中国面临源于西方、扩散至全球的现代性挑战以及在这一挑战中如何处理自身传统文明和现代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Modern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13, Issue 2, 2020, pp. 190 ~ 192.

② Shmuel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2000, pp. 1 ~ 29.

③ 参见 Justin Rosenberg, “Basic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Part II: Un-evenness and Political Multiplici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Issue 1, 2010, pp. 165 ~ 189; Justin Rosenberg, “Kenneth Waltz and Leon Trotsky: Anarchy in the Mirror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2, 2013, pp. 183 ~ 230。

④ 作者与高力克教授讨论《全球转型》一书及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2018 年 5 月 17 日)。

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中国现代性发展不可回避的两个根本性挑战，即如何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可以说是汤因比所说的文化之间“挑战和应对”问题。它自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就出现，横亘百年至今。作者在书中强调现代性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尚未完结的过程，存在不同的模式和特色，但总体上都受到三大动力的推动，而且这三大动力因素自身也是相互影响和联结的，它们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特征。与欧洲现代性原发国家不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在被动接受现代性时，其面临的是双重挑战，即除了与原发国一样具有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问题，还因为面对与自身差异极大的现代性浪潮需要更多的适应和调整，以使之本土化并与传统相融合。就当下而言，是否能回答好“东西—古今”命题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仍然至关重要。中国大国崛起的态势已为世界公认，但将以何种面目和态度立世，在世界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仅外界认知模糊而好奇，中国自身也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中国是延续严复单纯的“富强”思路、接受梁启超“世界公民”的乐观鼓动，还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现实主义策略中融入必要的软实力（如“和谐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倡导？显然目前还未有最优答案。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仍然在路上。但这并不奇怪，现代性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延续动态的过程。但有一些认识可以从曲折发展的经验中逐步清晰起来。第一，客观看待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性发展是全球转型大潮的一部分，今天面对的所有现实都是从19世纪受现代性全球转型波及进而被动参与其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对那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发展以及之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仅从“耻辱的”近代史和“悲情”的救亡使命出发去理解显然是过于偏狭和情绪化。^① 中国需要秉持相对客观的态度来追溯和正视自己的历史，避免自我中心，并将其置于全球现代性发展的大潮中来考察，兼从他国经验和自身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扎实而自信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从而为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科学而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国的现代性有个体独特性，但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特殊性。回答和破

^① 钱永祥：《中国思想者能摆脱“救亡”悲情吗：对韦伯困境的一种思考》，载[德]沃尔夫冈·J. 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导言。

解“东西—古今”命题,还需要认识到中国现代性发展是全球转型大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个体的独特性,但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特殊性。《全球转型》强调现代性是一个多样性的发展过程而绝非同质化的发展过程,每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同的,而且一直持续尚未结束。戴维斯·兰德斯甚至认为只有英国是唯一一个“自发式”现代性发展的案例,而其他所有国家的现代性发展都可视为对起源于英国的现代性的必要反应和模仿。^① 虽然西方其他国家与英国的同质性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与英国的同质性大得多,但各自也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同样是资本主义,也会因不同文化和治理形式呈现不同面貌。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就是两种典型的有差异的资本主义存在。^② 第一轮现代性国家之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面临如何协调自身传统和文化来适应全球裹挟式扩展的现代性进程,例如日本和印度。日本在地域上是一个亚洲国家,也是在近代遭逢西方现代性挑战、受挫之后,它选择了一条完全接受的转型道路,其工业化过程迅速而彻底,很早就被西方国家接纳,成为全世界眼里身处亚洲的西方国家。印度的工业化进程没日本快,却在长期的英国殖民历史中顺利植入了理性国家的体系和建制,其自身漫长而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没有对现代性发展造成较大困扰,而是出现西方民主制度与印度传统文明(例如种姓制度)奇怪却又和谐共存的国家与社会,并为西方社会接纳。日本和印度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也是从被动开始,逐步适应和调整而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因此,对中国而言,没必要为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和缓慢从自身特殊性上寻找解释和开脱,也不必再纠结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问题。发端英国迅速遍及欧洲而后波及世界的现代性发展,是一个与本土结合尚未结束的过程。每一个国家在全球转型的大潮中选择与适应,呈现的进程和结果也各有不同,中国也不例外,应该具有对自身现代性发展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平常心和自信心。

(二) 从自身现代性发展轨迹中汲取经验

建立自信心不是盲目自信。无可否认战争和内乱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缓慢的

^①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9, pp. 124~126.

^② 参见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从《全球转型》一书中提出的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因素，即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来考察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反省和思考。

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曲折复杂，经历多个阶段，学人多有著述。^① 布赞和劳森认为中国现代性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中华帝国的衰落和对现代化抵制阶段；内战和日本侵略阶段；毛泽东激进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和习近平“中国梦”阶段。^②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与后两个动力因素，即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相比，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是几乎没有争议而得到相当一致的坚持。对此，唐德刚先生曾风趣的调侃并指出“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③ 无论晚清的洋务运动、民国的“五四”救亡启蒙还是毛泽东的“超英赶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近代以来至今的中国都将工业化作为立国之本、强国富民的出路。虽然在如何工业化的问题上始终存有疑问和争论，甚至挫折和失败，这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但通过工业化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认知却是清晰和明确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作为后发和外围国家，充分感知到现代化造成的“先进”和“落后”在物质存在上的差异性。

意识形态之争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中“东西—古今”的激烈碰撞，也最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如果说早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带有相对理性的折衷和调和色彩，之后的发展则演变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思想态势。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引进“德”、“赛”二位先生，认为千年儒学已老旧不堪，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桎梏，要选择杜威主义救中国；一战后调整到苏俄道路、列宁主义；到冷战时期长期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初期“拥抱蓝色海洋文明，抛弃黄色内陆农耕文明”和“反全盘西化”的

① 参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世纪出版公司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Modern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Issue 2, 2020, pp. 187 ~217.

③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全五册），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风潮激荡等等。总体上,面对现代性挑战,思想界处于一个简单化价值判断的摇摆和争论状态,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纷乱的原因之一。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速度加快,经济增长迅猛,成为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思想方面,中国抛弃了意识形态之争(邓小平“不纠缠姓资姓社”、胡锦涛“不折腾”),也出现了相对包容的多元化状态。可以说进入 21 世纪,中国已经开始明确地、系统地融入到全球现代性发展的范畴中来,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力量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并进入了工业大国之间的常规竞争模式,在国际社会中也被公认为大国。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发展的新型现代性图景越来越清晰。

在理性国家建设上,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经常存有质疑和争论。韩水法教授撰文指出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国家的转型。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尚未被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完全接纳。^① 这反映了当下现实,也存有许多讨论余地。民族国家是一个源自近代欧洲的概念,与当时反抗和脱离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历史背景相关。因此,是否可以参照孔飞力先生(Philip Alden Kuhn)的方法,跳出西方中心的语境,用“现代国家”概念来指称每个国家今天的“现代”状态,因为在不同内外因素压力下形成的对现代性挑战的应对,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路径。^② 中国现代化成功与否为什么存在需要被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的问题呢?首先是外在原因。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是现代性的成果。恰如布赞和劳森在书中指出的 19 世纪的现代性发展造就了巨大的权力差距,长期以来西方处于权力中心和支配的地位,而广大的后发国家则处于权力边缘。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席卷全球的全球转型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或者说是全球西方化。其次是内在原因。在具有权力“中心—边缘”分布特点的国际体系下,后发国家想要在国际上实现自我利益、争取相应权力必须通过遵守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社会来获

^① 韩水法:《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第 4~29 页。

^②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中文版序言。

得。中国的 17 年重返联合国之路、15 年艰辛入世谈判以及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到承认问题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有就是全球转型在当下出现了新变化、新趋势。2008 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出现经济下滑和疲软态势,而新兴经济体不断跃升,世界出现从以往以西方为主导的“有中心的全球化”转向“去中心的全球化”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全球瞩目,而且“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热议话题。在许多西方政府和学者眼中,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建制,或者说不匹配的国家建制与其他两大动力因素一起促成了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实在是件非常费解的事。其核心关切是:其一,中国模式是否成立?即这种动力因素不匹配的现代性发展是否是独特的中国模式?其二,高速发展的中国在崛起之后将以怎样的角色认知来参与世界,发展自身与其他国家和世界的关系?

小 结

综上所述,本文谈了阅读《全球转型》的两大深刻感受和一个问题,并以现代性的主要推动力——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为工具来考察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过去和现在。本文认为中国是全球转型大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个体的独特性,但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特殊性;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发端英国迅速遍及欧洲而后波及世界的现代性发展,都是与本土结合的过程,现代性全球发展的历程和中国自身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为当下中国如何定位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有助于消解伴随 2020 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而出现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尽管中国现代性发展是不是一种模式尚待历史检验,但至少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经过百年多的适应和调整,在现代性发展之路上已渐趋成熟。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原亚洲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Athar Husin)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如果这种按照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看来不匹配的中国模式是有效的和

成功的,那么世界多几个这样的模式又何妨?^① 另外,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增长,它与守成大国和西方社会的紧张将会持续,在全球转型的去中心化过程中,冲突在所难免,但也不至于发生剧烈冲突。因为以现代性为推动力的全球化已将世界连为一体,特别是大国之间,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已经在各方面特别是经济层面建立了丰富而有深度的联系,打击和遏制对方,将毫无疑问伤及自身利益。对于西方来说,不要试图促进或寄望中国发生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现代性是全球范围的持续过程,但实现方式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一个完全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中国是不会出现的。同时,西方也应抛弃冷战思维,对中国的政治选择和国家制度采取宽容和尊重态度,并尝试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不能完全以西方标准来强加于人。对中国自身而言,是否“全盘西化”应不再是关注重点,专注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才是富国强民之道,理性的选择恐怕是一条调适“东西—古今”的中西合璧之路。在自身定位和与他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既要了解现代性发展是近代以来缘起西方并席卷其他各地的全球转型,是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要发展并强大绝无可能置身事外,而是要融入其中并在去中心化的全球转变中确保有利地位,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贡献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公共产品。中国又要在积极吸收先发经验教训中依据自身历史和文化特色,不再在“东西—古今”命题中摇摆挣扎,兼采优长走中庸和合之路,追求“六融贯通”:融入全球转型的现代性发展大势中;融汇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融通东西方文明;融恰古今(中国传统与现代),对吸收西方文明和承继传统文化这两方面需要特别检省。

正如许倬云先生指出的,“一百多年来,东方各地只是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与相应而生的城市化。西方文明中最可贵的价值:理性、人权和科学却没有在东方扎根。虽然在东方曾有一些人产生过复古的愿望,但寻找过去、界定过去、整理过去及重建过去的整个工作,却仍旧有待落实”。^② 中国不仅应融化

① 参见 Athar Hussain's Talk at "China Model 2" Given by Speakers: Dr Kent Deng, Professor Jude Howell, Professor Athar Hussain, LSE Lecture, Recorded on 8 December 2011。

② 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02 页。

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大国关系，低调行事，理智交往，而且应融畅全球，关注人类共同命运，成就负责任大国。倘若如此，不仅横亘百年的“东西—古今”命题将得到很好的回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日臻完善，而且许向全民的中国梦，许向世界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变得清晰而有路径可达。